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会梁氏·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/罗检秋著.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9
(文化名门世家丛书/黄兴涛主编,干春松副主编)

ISBN 7-300-03011-4/G·528

I. 新…

II. 罗…

III. ①梁启超(1873—1929) - 家史

②梁启超(1873—1929) - 家族 - 文化史

IV. B25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5479 号

文化名门世家丛书

黄兴涛 主编 干春松 副主编

新会梁氏

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

罗检秋 著

出版发行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)

发行部:62514146 门市部:62511369

总编室:62511242 出版部:62511239

E-mail:rendafx@263.net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涿州市星河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5.625 插页 8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64 000

定价:22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“文化名门世家丛书”序

每当我们由陈寅恪而追念陈三立、陈宝箴，由俞平伯而溯至俞陛云、俞樾，或由梁启超而谈到梁思成、梁思永时，心中总会不期而然地涌起一种文化幽情。在他们背后，不仅有“家”的含义，有学术文化“底蕴”，而且存在着杰出的学者、文化人个体与家族群体和时代文化关联着的历史。于是，一个概念在我们心中形成。即“文化名门世家”。

与那些政治上的豪门和经济上的大族不同，“文化名门世家”的崛起、发展，虽与社会政治往往有程度不同的关系，但却主要以其在文化学术方面的活动、成就、特色或影响而卓然自立，名家辈出、享誉后世。简言之，它们主要靠文化学术事业传世，而非赖政治和经济影响而立名。

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，名门望族与社会、政治和文化的关系，一直为史家所看重。但相对于政治史上的豪门和商业史上的巨族而言，对于文化学术方面的名门世家，特别是近代以来文化名门世家有意识地进行整体把握和专题研讨，给以关注，加以凸显，则似乎还很显不足。说它尚属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史领地，大概并不为过。

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，文化学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屡见不鲜。如东汉著名史学世家班氏（班彪、班固、



班昭)家族,宋代著名文学世家苏氏(苏洵、苏东坡、苏辙)家族,明清之际的学术世家万氏(万泰、万斯同、万经)家族,清代朴学世家王氏(王安国、王念孙、王引之)家族等等,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它们在中国古代辉煌的文化学术史上,实闪耀着别样的光辉,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。陈寅恪先生在其中古史研究中,就曾强调指出:“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”(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329页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),这对我们认识名门世家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,不乏启发意义。

事实上,抉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学术名门进行专门考察,除了能更好地认识那些成就非凡的文化名人,他们的文化贡献及其所涉及的文化领域之外,还能有助于了解其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时尚。因为他们人非一人,代非一代,彼此既相互影响,所涉文化范围又较广,时间跨度也较长之故。以明末清初为例,考察此期学术思潮、社会心理和士林风气的演变,浙江鄞县万氏家族就是一个极佳的个案。文人学者万泰,他的八个儿子即“万氏八龙”(史学家万斯同,经学家万斯大、万斯禎,诗人和书法家万斯备等),孙子万言、万经等,都是当时很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化人。通过整体透视他们的文化学术生涯,对于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心态及其在文化学术上的投影,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乃至以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现象,都将会有更加真切、生动和具体的了解,特别是对它们彼此之间复杂联系的认识。遗憾的是,我们至今仍然见不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专题著作。

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到晚清以来的文化界,同样会发现,在一个个熟悉的、响亮的名字背后,往往也存在着值得重视的家族文化纽带。这种背景就像一根根银线,把一个个耀眼的文化明星和学术巨子们贯穿起来。除了前面所



提到的那几家之外，像建德周氏（周叔迦、周一良和周绍良），无锡二钱氏（钱穆、钱三强；钱基博、钱钟书），以及刘师培家族，张东荪、张尔田家族，叶恭绰、叶公超家族等等，都无不是群星闪耀、学术文化底蕴深厚的世家名门。一百多年以来，中国由清朝而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在向世界开放和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，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，因此这一时期每一个世家名门家庭关系的演化，家风门风的形成、传递，乃至每个成员文化学术道路的选择等，便自然打上时代的烙印，凝聚着不同于往古的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，经历着从传统的家学渊源、私家授徒到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术传承的转换；经历着从读书做官、科举入仕的传统士大夫学人到现代职业学者和新型文化人（如记者、作家、编辑、出版家等）的转换；经历着从旧式文化学养和学术视野到融合中外、学贯中西的转换，以及一系列人生、社会和学术价值观念的转换。这些转换在各个名门世家里是如何实现的？他们形成或受到过何种独特的家族传统或文化精神的影响，这些家族传统和文化精神对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，又具有怎样的意义？诸如此类，都是引人深思、值得探究的问题。

我们欣赏梁启超家族文化学人的达观进取、博采创新的风范；也为义宁陈家诸大师的忧郁而凝重、精深而固执的气质所吸引。这里的确是一片丰富多彩的世界。具体考察这个世界里的各个文化名门世家，无异于为透视和了解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，寻找到一个个有趣的窗口。透过这些窗口，人们可以领略文化名人与学术巨子的人生风采、文化品格、学术追求和治学方法，可以增进有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知识，可以总结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



历史经验，乃至获取关于家庭教育的有益启示。因此，“文化名门世家”又可能是一具有广泛阅读面的雅俗共赏的题目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课题本身的涵量，它究竟能“现化”到何种程度，尚取决于耕耘者们的“开掘”水平。

应当说，我们这套丛书还只是从几个个案的角度来接近一课题而已。丛书现有的个案考察、视角和写法各异，由于理解有别，时间仓促，就整体而言还只能算作一个有益的尝试。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投入到这一课题之中，以开拓和深化这方面的研讨，包括对近代以前文化名门世家的研讨。我们相信，这方面广泛深入的研究，一定能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认识。

黄兴涛

1999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



引言

金秋时节，北京的香山已是漫山红叶，层林尽染。卧佛寺东边的山坡上有一片开阔的墓地，在青松翠柏的簇拥中，显得分外幽静、庄严、肃穆。

沿小路爬坡而上，经过郁郁葱葱的柏树林，便来到花岗石砌成的墓基之上。形状如榑的汉白玉墓碑面南耸立，上刻“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”。这便是一代文化宗师梁启超和夫人李蕙仙的安息之所。墓碑是任公的儿媳著名建筑师梁思成、林徽因设计的，背面刻着任公九位子女的名字。墓的后面有两棵高大的白皮松。靠东边还有一棵较小的白皮松，是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等人种植的“母亲树”，以纪念任公第二夫人王桂荃，一位默默奉献的善良女性。看着这三棵枝繁叶茂、生机勃勃的白皮松，令人想起和谐、美满的梁家。

墓基下方的松柏林中，有任公弟弟哲学史家梁启雄的墓。炮兵上校梁思忠、图书馆专家梁思庄也在这里陪伴着慈爱的父亲，也许在继续聆听教诲吧！整齐葱翠的松柏林中，墓基西侧九棵高大、挺拔的松树尤其引人注目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九棵松树已成栋梁之材，任公的九位儿女也在他身后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伫立林中，静听阵阵袭来的松涛声，不禁联想起南国海边新会的波涛。梁任公说：“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。”然而，这出自耕读之家的“岛民”竟成为一代宗师。





百年来风云变幻，潮起潮落，却未能冲淡梁启超的影响。理性地回味他对中国文化的见解，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改造、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……，至今都不难感觉到其珍贵价值。不仅如此，梁启超的匆匆一生也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况味。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炽热的爱国情怀，在中西冲突、文化转型之中的复杂心态，更发现了中国文人士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典型意义。梁启超留下的不止是1000多万字的作品，还有他那“修身、齐家”的精神力量和深刻启示！

近代以来，一些思想家、学者比较中西特点时，莫不承认中国文化的家族主义色彩。家族是个人成长的起点，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，举凡国家的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伦理等等，无不渗透着家族主义的因素。所谓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，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。“修齐治平”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想，也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体现。实际上，“齐家”是事功的起点。

不幸千百年来，不要说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的理想高调入云，真正做好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的又有几人？梁启超渴望祖国富强、人民安康，不断地为此奔走呼号。他为维新运动、立宪政治、护国运动屡建功绩，但终究没能施展其政治抱负。专制主义阻碍了梁氏的事功道路，他转而将“治国”之梦托之于文化启蒙，并将人生感悟润泽在子女身上。他把众多子女培养成有益于社会的学者、专家，造就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世家。这显然蕴藏着深厚的“齐家”之道。

透过梁家，我们仿佛看到了家族文化的巨大转变。梁家作为一个学术、文化群体带有传统家族的某些色彩，但既不是“贾府”式的世家大族，也非以祠堂、族田为纽带的乡村家族。在近代商品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，家族





主义的政治纽带逐渐崩溃，依靠官职荫庇的政治家族日渐减少。乡村中带有封建性的族权也在衰落，祠堂、族田、族谱的纽带作用渐趋弱小。代之而起的是经济纽带和文化纽带。与近代兴起的实业家族不同，梁家纯粹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心。他们没有万贯家财，没有显赫权势，而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震撼却又经久不息。当近代许多政治领袖、军界巨头在历史记忆中模糊之时，梁启超、梁思成、梁思永……这些形象仍然耸立在人们的心中。这个脱胎于新会梁氏的文化世家具有怎样的魅力和意蕴？

本书以梁启超为中心，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评析梁家学者的人生历程、学术成就和思想探索，从而感受一个文化世家兴起、发展的生动历程和典型意义。



目 录

引言·····	1
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新会梁家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	---

一 家族·家世·····	1
二 家学·家教·····	10
三 “凌云塔下凌云想”·····	17

第二章 海纳百川·····	26
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学海堂：治训诂词章·····	26
二 万木草堂：超越乾嘉学派·····	29
三 从《时务报》到时务学堂·····	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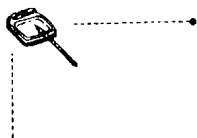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创造的新世纪·····	63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流亡生涯·····	63
二 输入西方学理·····	74
三 传统的阐释与创新·····	82
四 “新民说”·····	100

第四章 探索现代化·····	118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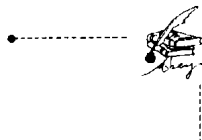
一 推进宪政·····	118
二 尝试民主政治·····	130
三 中国式“社会主义”·····	146





第五章 文化宗师	156
一 “文化调和主义”	156
二 “著论求为百世师”	172
三 导师风范	188
第六章 手足之间	212
一 词学名家梁启勋	214
二 哲学史家梁启雄	245
第七章 薪尽火传：梁启超与下一代	261
一 两代情深	261
二 政治与学术之间	277
三 学问之道	284
四 “寒士家风”	293
第八章 阐释建筑文化：以梁思成为中心	304
一 学贯中西	304
二 初露锋芒	313
三 从建筑体味文化	321
四 流亡学者	337
五 为了北京城	347
六 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	363
七 学界宗师	377
第九章 发掘古文明：梁思永	398
一 从书斋走向田野	398
二 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	413
三 重识远古文化	424





第十章 回响与余韵	438
一 图书馆专家梁思庄.....	438
二 走近民生现实的梁思达.....	450
三 火箭专家梁思礼.....	461
四 余韵流长.....	469
 结语：一个意蕴深厚的文化现象	473
 附录一：新会梁氏世系	480
附录二：参考书目举要	483
后记	486



第一章 新会梁家

梁启超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。他是一位改革家，又是一位文化宗师。一百年前，他与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，而影响却是那样持久。晚清、民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无不受任公文章的感化。崛起于五四的知识分子多继承、发展了梁启超思想，毛泽东、胡适、郭沫若、鲁迅……是明显的例证。青年毛泽东崇拜梁任公，因“新民说”的启发而创立“新民学会”；胡适自称“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”，思想上“不能不跟着他走”；郭沫若认为梁氏对旧思想的批判，“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”，青年学生无不“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”；至于鲁迅最突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，可以说直接来源于梁氏的“新民说”……

不论怎样评价梁启超的是非功过，都无法否认其思想导师、文化宗师的地位。他是近代中国的巨人，是时代造就的英雄。沧桑巨变的近代中国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梁启超，而不是别人，这并非寥寥数语所能解释。除了“时势造英雄”这种普遍规律外，岂可忽视其自身资质和成长环境？

近代文化名门中，新会梁家原来门第低微，属于乡村常见的耕读之家，地位、财富微不足道。有人说梁启超出身于大乡绅之家，有人说是自耕农。确切地说，不过是普

家族·家世





通的下层乡绅，他的祖、父辈，正从农民向绅士转变。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中国社会，士、农之间职业分途，文化熏染有异，行为方式和心理积淀存在区别，社会地位更是相去霄壤。绅士阶层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基础，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，享有各种特权。他们主导学术文化，传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，也承担若干社会职责，管理地方事务，如排纷解难、举办公益、维护治安、劝导乡民。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，令农、工、商人羡慕，而为之奋斗。

不过，绅士与农民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。相对于欧洲中世纪，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大。豪门大族可能身败名裂、家产荡尽，沦落于社会底层。农民也可能在努力和机遇中跻身绅士，甚至飞黄腾达。隋唐以后，除了极少数的封赏之外，农民进入绅士阶层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。科举制度与宗法社会共生共荣，强化了人们的科举意识和家族观念。

新会梁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据说西周末年，秦仲的少子康封于夏阳的梁山，是为梁氏之始。康六十三传至宋代的梁绍。梁绍中进士后，任广东提干，择居南雄珠玑里。广东新会梁氏发源于此。梁绍传三代到南溪，始迁居新会县的大石桥。明朝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年），梁南溪的十二代孙梁谷隐从东能的大井里迁居茶坑村。据茶坑梁氏族谱所载：梁谷隐的十世孙名上悦，字光恒，生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便是梁启超的高祖。其子名炳昆，字饶裕，生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即梁启超的曾祖。炳昆共有八子，次子名维清，字延后，号镜泉先生，生于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，卒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。他就是梁启超一再称颂的祖父，也是真正对梁家的兴起具有实际意义的人物。





梁启超以前，新会梁氏默默无闻，青史无名，茶坑村更不待说。这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。这里既非政治中心，也不及富庶的江浙地区。梁启超自称：“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。”^[1]新会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，距省城广州一百余公里。县城往南二十多公里，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，江口冲积而成七个小岛，茶坑村就在位居中央的岛上。这里虽然雨水充足，四季常青，而天灾频繁。《新会县志》记载：

夏秋之间，时有飓风。其作也，断虹先兆，海气沸腾，狂飚震撼，毁屋拔树，徙舟于陆，浮苴于林。其势起东北而竟西南，或一岁一发，或数岁一发。又有石尤风。其作也，黑云翔涌，猝起俄顷。……濒海地卑土薄，故阳燠之气常泄，阴湿之气常盛。二者相搏少寒多暑，而村落依山者炎气郁蒸尤甚。^[2]

这里，人民多以薪炭耕渔为业，依靠辛勤的劳动维持简单的生活。梁启超的生地茶坑村依山濒海，地势低洼，潮汐萦回，是极普通的乡村。村前为长期冲积和乡民自填自围开垦的耕地，静静的小溪穿流其中，村后是树木葱茏的熊子山。19世纪早期的茶坑村仍然是一个平静而贫穷的“世外桃源”，大部分田地为农户私有，自耕自食，生活艰苦，养成了乡民勤俭、朴素、务实、刚直、粗犷的性格。

1815年，梁维清出生时，梁氏已是茶坑村的大家族。全村5 000余人，其中梁姓约3 000人，其他为余、袁、聂等姓。梁姓有远近不等的血缘关系，有族谱、祠堂、公有族田“祖尝”，还有政治机构“耆老会议”。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人们聚族而居，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思维定式。像亿万中国人一样，梁氏也深深浸染于家族文化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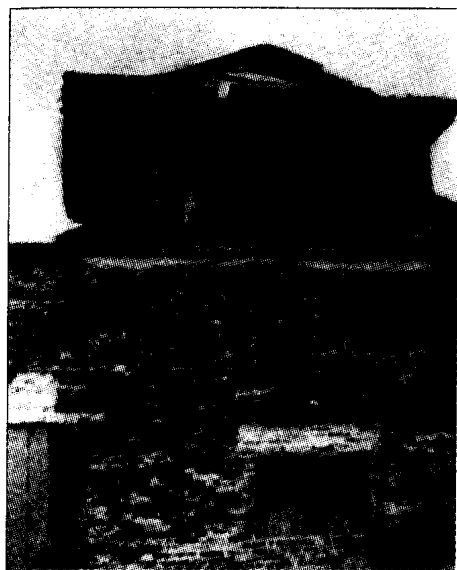


据梁启超回忆，茶坑村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自治制度。全村共分三保，梁姓为一保，其他各姓共为两保，三保联治机关称为“三保庙”，决定村中利害大事。梁姓的自治机关设在梁氏宗祠，称为“叠绳堂”，下面还有各支分祠。“叠绳堂”由50岁以上的梁姓子孙组成“耆老会议”。

“耆老”总数约60至70人，并设值理4至6人（其中2人为会计），由壮年子弟担任。值理负责办理日常事务，也可列席“耆老会议”，一般知书达理、比较能干，家境也较好。梁启超的父亲曾长期任“叠绳堂”值理。梁姓还有一位“保长”，负责家族与官方之间的事务，每户出米3升作为“工资”，但其地位卑微，未到年龄也不得列席“耆老会议”。

“耆老会议”纯属家族活动，开会称为“上祠堂”，每年春、秋二祭的前一天举行例会，会期一两天到三四天不等。春祭会主要

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，秋季会则报告财务安排及新旧值理交接。平时遇上重要事情也要举行会议，一般每年开会20次以上，但出席会议的“耆老”们常常不及半数。“耆老会议”的主要内容是调解和裁判家族内部的纠纷。遇有纠纷，最初由亲支“耆老”调解，不服则诉诸“叠绳堂”，仍然不服才诉诸官府。“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讼，乡人认为不道德，故行者极稀”。祠堂是家族活动的中心，敬神祭祖都在这里举行。每次祭祀用过的肉（胙）都分给族内村民，分胙的多少成为家族内的奖惩标志。“子弟犯



● 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梁启超出生地





法，如聚赌斗殴之类，小者上祠堂申斥，大者在祠堂边跪领鞭扑，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，更大者革胙。停胙者逾期即复，革胙者非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罪不得复胙，故革胙为极重刑罚”。

南方各省宗族观念根深蒂固，宗族械斗时有发生，广东尤甚。官府对此常常无能为力，听之任之，至清末，地方治安恶化，民不聊生。为保一方平安，许多家族都建立了乡团，梁姓也不例外。乡团由梁姓与三保联治机关共同组织，分担经费。团丁由壮年子弟自愿充任，但须得“耆老会议”的许可。乡团的枪支、弹药分别由团丁和祠堂值理保管。团丁可以领受双胙，但如盗卖枪支，将会受到永远革胙的严惩。

梁氏祠堂的主要收入是“尝田”。“叠绳堂”约有七八顷“尝田”，由本祠子孙租种，向祠堂缴纳十分之四的产品为租。同时，村里新淤积开垦的田地都归“叠绳堂”，不得私有。祠堂的收入主要用于扫墓、祭祠，也用于筹措治理村前小河的物料，资助正月放灯、七月打醮等娱乐活动。

茶坑村的经济活动也有家族色彩。村中有名为“江南会”的组织，类似于信用合作社，每会以20年或30年为期成立，会成之后，3年或5年开始抽签还本，先还者得利少，后还者得利多。所得利息，除每年岁末分胙及大宴会所费外，全都分配给会员。兴盛之时，茶坑村的“江南会”多达三四个。“乡中勤俭子弟得此等会之信用，以赤贫起家而至中产者盖不少”。茶坑村还有类似消费或购买合作社的组织，常常是若干家联合，以较廉价格购进大量肥料，或者合营出售本村的主要产品葵扇、柑子。这种组织多是临时结合，也有延续多年的。会中收取的若干费用，除捐助乡民娱乐活动外，一般都用于年终增加分胙。





乡村的初级教育——私塾，实际上是家族学堂。茶坑村梁姓共有三四所蒙馆，大多借用“叠绳堂”或各分祠作为教室。“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的人。学费无定额，多者每年30块钱，少者几升米。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，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，其所负之义务，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，亦不得拒其附学”^[3]。可见，茶坑村梁氏的主要社会活动，都是以家族为中心，家族是村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保护伞。因此，村民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。

与此相关的是尚读书、求仕进的心理。大凡一个显赫的家族，都必须有一些读书人，形成比较坚强的绅士阶层，跻身官场，或交游士林，以维护其政治、经济利益，并为家族创造良好的教育、文化环境。他们也可通过家族传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。然而，与许多名门显族不同，梁姓世代耕种，没有出过一位秀才。“耆老”只是一些年长的村民，虽然有贫有富，却主要是处理家族内部事务，“除了纳钱粮外，几与地方官无涉”^[4]。在有科第资财的他姓人面前，梁姓大而不显，没有权势，有时还受人欺侮。例如，有一年，茶坑村“三保庙”唱戏，附近天马乡的人撑着旧船来看戏，临走时，却把茶坑村的新船撑走了。对此，梁姓人毫无办法，没能把新船找回来。^[5]正因此，一般社会尚读书、求仕进的心理，在茶坑村梁氏表现得非常明显。梁姓家族尊师务学，且建立了励学机制，例如，取得科举功名者可以从“公尝”得到奖励，有“功名”（秀才、监生以上）的年轻人也可参加“耆老会议”。

梁维清的祖父辈都是自耕农，他父亲是独子，从祖辈继承了较一般农户稍多的田产。他父亲原以耕稼为业，后来因为激于邻乡的一个在广州府当差的人的欺侮，才出钱到县里买了一份粮差来当，但是不久，他因看不惯差人们的贪污腐败行径，便愤然辞职不干。一家衣食充足之后，

